

美国动态

(半月刊)

2021年6月1日 (第238期)

内部交流 仅供参考 请勿引用

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



何瑞恩：“打中国牌”有风险

靠“打中国牌”来解决美国国内分歧不可能成功，而且可能会损害美国在国内外的利益。

中美关系

美学者：中国并非拜登所言的竞争性威胁

美国企业研究所（AEI）网站 5 月 12 日登载该智库研究员乔纳·戈德博格（Jonah Goldberg）的文章称，中国并非拜登所说的竞争性威胁，政客们利用竞争力这一话语是为了使他们想做的事情合理化。文章摘要如下：

拜登宣称，美国应与中国和其他国家展开竞争，以赢得 21 世纪。为此，美国应该在教育和社会福利上投入数万亿美元。实际上，经济竞争力早已是美国政治中两党都使用的老生常谈了。

政客们利用经济竞争力这一话语来为他们想做的事情辩护。民主党人希望享有更多权利，增加教育支出和就业项目。他们声称这些变化将让美国更具竞争力，以使这一议程听起来更强硬、更严肃、更紧迫。同样，共和党人利用竞争的话语来推动降低企业税率，称更低的税率将为美国吸引更多创新和投资。

政客们在上世纪 80 年代用这一话语来谈论日本，现在他们又用该话语来谈论中国。但是，中美在经济上仍存在很大差距。譬如，美国的人均 GDP 世界排名第 13 位，而中国排名第 79 位；相比中国，卢森堡和瑞士超过美国更多。然而，政客们却从未谈论要在竞争中胜过卢森堡或瑞士。

美学者建议美警惕对华电池技术依赖

哈德逊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高级研究员纳迪亚·沙德罗（Nadia Schadlow）5 月 12 日在美国 War on the rocks 网站撰文称，拜登政府的某些气候目标可能会使美国从依赖中东地区

的石油变为依赖中国控制着的电池技术。

文章称，拜登政府减少美国电力和交通部门温室气体排放的措施很可能被中国“把控”。美国实现化石燃料转向可再生能源发电以及部署更多电动汽车都取决于电池。而中国目前控制着电池开发的整个生命周期。中国在新兴绿色产业中的优势是一项“战略挑战”。

过去 20 年来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依赖中东的石油。当拜登政府转向可再生能源并减少碳排放时，它不应该用一种依赖替代另一种依赖。美国在电动汽车及其原料制造中成为全球领导者的努力不能建立在对其最主要的竞争对手的依赖之上。中国深耕多年以占据关键技术的高地，不会轻易让自己的优势流失。此外，由于欧洲电动汽车制造商对中国的依赖，中国还将制约拜登与欧洲和其他盟友建立技术联盟的努力。

为了避免对中国的潜在依赖，美国应该把清洁能源技术作为一个竞争空间。拜登政府应首先对供应链进行新的审查，利用现有设施，并鼓励美国或外国供应商进行新的投资。

拜登的团队需要做出选择，并在国内为之努力。如果美国要增强在国内处理生产电池所需矿物的能力，就不得不克服这些处理设施会给环境带来挑战这一事实。新政府可以在其气候目标上取得进展，但这样做将需要一些气候现实主义，并使用竞争性政策使美国在电池技术和制造方面不再依赖中国。

李成：上海中产阶级如何重塑中美交往

布鲁金斯学会 5 月 14 日举办线上会议，邀请其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李成和耶鲁大学社会学教授黛博拉·戴维斯（Deborah Davis）、哈佛大学政府系教授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 等学者, 就李成的新书《中产上海: 重塑中美交往》(Middle-class Shanghai: Reshaping US-China Engagement) 展开讨论。

李成指出, 该书驳斥了三种观点: 一是将中国视为一个由无差异的阶级与社会所组成的整体; 二是在无视中产阶级的多样性及其正处于转型期的政治角色的前提下, 将整个中产阶级视为“政党国家的政治盟友”; 三是认为双边教育交流只会对中国有利并且将削弱美国的霸权和安全。

书中主要探讨了这一问题: 如果美国与中国社会“脱钩”, 特别是与其中多样化的中产阶级“脱钩”, 那么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 美国能发挥什么影响? 李成认为, 作为两个超级大国, 中美都没有动机和能力去消灭彼此。因此两国必须通过重塑中美交流的方式, 找到一个全新的共生途径。

李成指出, 上海作为中产阶级与归国留学生的摇篮, 对各阶层都具有巨大的影响。上海的海派文化及中产阶级将从文化交流的领域重新塑造并理解中美双方的立场, 这将是重塑中美关系及双边印象的第一步。

裴宜理认为, 中美通过中产阶级之间的合作和交流建立友好关系至关重要。在这个特殊的时期, 不将中国社会妖魔化在是非常正确的一步。两国之间的问题其实非常相似, 但是首先要做的是认识到双方都存在的问题。

戴维斯称, 跨国文化交流对于上海的历史进程与理解中美关系有巨大帮助。通过认识到每一代人不同的回忆和偏见, 美国可以重新认识中国社会中的多样性。她还指出, 三方或多方交流合作将有助于促进中美关系。譬如, 设立中美德三方的高中教师交换项目, 让各个国家的老师去其他国家学习他国历史。这些小规模的合作将对中美交流产生非常正面的影响。

荣鼎集团发布报告分析 2020 年中美投资趋势

荣鼎集团近日发布报告《双行道：2020 年美中投资趋势》，总结了过去一年中美主要投资发展情况，同时展望了 2021 年的发展前景。报告主要发现如下：

第一，中美两国的外国直接投资（FDI）在 2020 年下降至 159 亿美元，这是自 2009 年以来中美双向投资的最低水平。2020 年，完成的中国在美直接投资额达 72 亿美元，较 2019 年的 63 亿美元略有增长。美国对华直接投资降至 87 亿美元，较上年下降了约三分之一。尽管上半年新冠疫情严重影响了绿地投资，但随着下半年中国经济逐步回稳，加之与疫情相关的限制放宽，绿地投资强势回升。与去年相比，美国投资者开展的重大绿地投资项目有所减少。

第二，双向风险资本（VC）投资总额与轮融资（funding rounds）均有所下滑。中国在美风险资本投资小幅增长，并首次超过了其他方向的投资。相比之下，美国在华风险资本投资降至五年来的最低水平。尽管《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FIRRMA）对外国投资进行严格的监管审查，但中国在美风险资本投资从 2019 年的 23 亿美元上升到了 2020 年的 32 亿美元。

美国对华风险资本投资交易总额与交易量均有所下降。2020 年，美国在华共进行了 247 轮独特融资，相比去年的 306 轮有所下降，投资总额降至 25 亿美元。金融和商业服务以及健康、制药与生物技术领域是美国风险投资者最常见的目标。

第三，后疫情时代的复苏可能会触发双向投资的反弹，但华盛顿和北京的政策发展具有不确定性。中国政府如何把握国内金融稳定与对外开放之间的平衡将塑造投资格局。在流入方面，未来取决于中国是否会改善外国公司的竞争环境，以及“双循环”战略与产业政策将产生何种影响。

在美国，拜登政府已表示将维持过去几年实施的限制性政策中的关键要素。但是，新政府有可能改变风格，在正当程序、透明度以及对外国投资的非歧视性开放方面，恢复外界的信心。供应链安全规则、下一代反垄断法以及保护个人数据的新举措都可能对中国公司与投资者产生深远影响。

除了国家政策，更广泛层面的地缘政治动态也可能会影响双边投资环境。拜登政府将与盟友的合作放在首位，这可能导致发达经济体在投资审查、出口管制以及人权等领域采取更加协调一致的行动。如果这些协调行动能提升国家安全相关方面的透明度与可预测性，那么这可能会支持中美在非敏感领域的投资。但是，更高的市场经济协调也可能引发更广泛的重新思考，从而激励中美投资者转移其关注点。

何瑞恩：“打中国牌”有风险

靠“打中国牌”来解决美国国内分歧不可能成功，而且可能会损害美国在国内外的利益。

美国 NOEMA 杂志网站 5 月 20 日登载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项目高级研究员何瑞恩(Ryan Hass)的文章《打中国牌》称，靠“打中国牌”来解决美国国内分歧不可能成功，而且可能会损害美国在国内外的利益。文章摘要如下：

对拜登来说，呼吁美国人团结起来应对中国构成的挑战有一个更直接的目的，那就是缓和党派分歧和促进国家团结。在当下激烈的党派纷争中，对华政策已经成为民主党和共和党最容易达成一致的议题。然而，“打中国牌”也存在风险和不确定性。

第一，今天的美国与 20 世纪 50 年代冷战时期的美国存在很

大不同。艾森豪威尔时代的美国是一个稳定的、相对具有凝聚力的社会，而拜登领导下的美国具有政治部落主义和个人主义的特点。与 60 年前相比，动员民众应对地缘战略挑战可能是一项更为艰巨的任务。

外交政策挑战也不像二战后那样处于国家思想的最前沿。有证据表明，外交政策界和华盛顿之外的广大美国民众之间的脱节越来越大。也就是说，中国可能不会像一些人希望的那样成为政治动员或两党合作的“门票”。

第二，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对于如何管理中美关系的动机不同。共和党作为反对党，并不为中美关系恶化的后果负责，也不害怕在拜登的领导下被指责是中美关系恶化的原因。如果共和党人认为拜登执意要把中国作为两党合作的滩头堡，他们可能会为配合而抬高要价。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共和党目前正在寻求一个能统一党内的话语，以弥合内部分歧，他们可能会利用中国问题加强党内共识。

第三，对华政策的政治化还可能产生其他负面影响。其中之一是种族主义。加州大学仇恨与极端主义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2020 年美国主要城市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增加了 146%。这些事件撕裂了美国社会，玷污了美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形象，还导致美国放弃了其最大的比较优势之一——吸引最好的想法和最聪明的人才到本国的能力。

对华政策的政治化还可能使美国及其盟友和伙伴就中国问题进行协调的能力复杂化。美国对华政策越受国内政治因素的影响，美国与盟友的政策协调可能会越少，其与北京的分歧也越可能投射在意识形态方面。

第四，美国政客越是为了在国内政治上得分而指责中国，北京就越有可能以同样的方式回应。对华政策的政治化将需要一些

限制，以为拜登政府以合理的战略原因作出决策保留空间。拜登政府似乎意识到在对华问题上需要在政策和政治之间取得平衡。他认识到，在全球范围内对中国持敌视态度可能会削弱他实现其优先目标的能力，如在气候变化、全球经济复苏或加强世界公共卫生基础设施方面取得进展。除了负责任的治国方略，拜登政府可能还需要要求其国会支持者和媒体在国内政治中“打中国牌”时遵守类似的负责任的原则。

美国外交

美学者称华盛顿需克服对全面贸易协定的恐惧

美国《国会山报》网站5月17日登载哈德逊研究所日本研究副主任赖利·沃尔特斯（Riley Walters）的文章称，华盛顿应克服对全面贸易协定的恐惧，加强与贸易伙伴的合作。文章摘要如下：

近来，加入全面贸易协定的想法几乎成了华盛顿的禁忌。很明显，议员们更喜欢针对某个经济部门的协议或“小协议”，而拜登政府继续关注其“重建美好未来”议程，这使得它现在不太可能主动签订新的、全面的协议。尽管拜登希望重建美国，但在美国之外，贸易环境将使美国更难在全球经济中竞争，美国将失去制衡中国在印太地区影响力的重要杠杆。

如果拜登政府想要一个优先考虑美国工人、支持劳工利益、应对气候变化的贸易议程，那么在现代贸易集团——如《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之外来推进这些利益将是缓慢的。

如果国会有意与中国竞争经济和政治影响力，特别是在亚

洲，美国必须更开放地与越南等贸易伙伴接触，积极与这些国家谈判贸易协定，或认真考虑加入 CPTPP。

尽管美国人现在比 20 年前更支持贸易，但华盛顿仍反感贸易。从历史上看，两党政客都一直坚持美国不断增长的贸易赤字和购买外国产品会损害美国工业的观点，还有人认为所谓的“中国冲击”和贸易竞争影响了美国就业。

在理想的情况下，美国政府和国会现在应该就加入 CPTPP 展开认真讨论，并与日本、越南和台湾地区加强贸易关系。如果拜登政府和国会想认真对待与中国的竞争，他们就必须克服对全面贸易协定的恐惧。

美专家称拜登的国家安全战略需解决三大问题

美国《国家利益》期刊网站 5 月 27 日登载美国传统基金会副主席詹姆斯·卡拉法诺（James Jay Carafano）的文章称，拜登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需要解决三个问题。文章摘要如下：

无论是否明言，拜登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都将以应对几个大国构成的挑战为框架。美国已连续有四任总统把中国、俄罗斯、伊朗和朝鲜列为首要关切，这构成了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最一致的威胁认知，反映了两党强烈的正统观念，短期内不太可能改变。

拜登的战略应该以其在大国竞争时代的有效性来衡量。以下是拜登团队必须解决的三个重要问题：

一是如何处理与中国的经济关系。华盛顿必须打破这样的观念，即为了维持与中国的经济关系，必须温和处理与中国的政治、军事、安全和外交分歧。这将不利于美国保护自身利益，并以牺牲美国的利益为代价推进中国的政策。许多国家正按照北京的要求行事，因为担心会失去业务和市场准入。因此，他们的中国政

策往往是混乱、不连贯的，从长远看会“适得其反”。但同时，反击中国不应成为各种经济摩擦和开支的借口。美国应对中国的政策应该有适当的范围并且有效。

二是如何在“灰色地带”开展行动。中俄朝的共同之处是都不想与美国开战，且都想不战而胜。因此，它们都在寻找时间、地点和方式来间接挑战和削弱美国的影响力。从宣传到代理人战争，间接消耗美国力量的方式五花八门。这些通常被称为“灰色地带”行动。为赢得大国竞争，美国需要确定这些行动中哪些是真正重要的，并以一种让美国以后处于更好的竞争地位的方式来应对。

三是如何平衡硬实力和软实力。硬实力不能代替软实力，反之亦然。二者都是国家力量中不可替代的要素。但这些工具中许多并不适合应对现代大国竞争。美国需要重整这些工具，如美国应在国际组织中展开竞争。同时，美国不能忽略硬实力的构建。

CNAS 为美国在印太地区推进“自由数字秩序”建言

新美国安全中心（CNAS）网站 5 月 27 日发布报告《在印太地区推进自由的数字秩序》称，在塑造亚洲数字化未来的竞争中，美国和其他地区的民主国家面临受挫的风险，中国在该地区 5G 基础设施发展方面正快速前进，并在印太国家更广泛的数字生态系统中发挥越来越广泛的作用。

报告称，为了确保数字发展最终服务于建立自由的地区秩序，美国需要与志趣相投的伙伴共同行动。

首先，在数字议题上优先考虑以结果为导向的外交。立即落实“四方安全对话”机制新兴和关键技术工作组的运作；在双边和多边环境以及专注于技术议题的专门小组中，就数字问题加强

外交接触；在涉及数字发展的国际组织中发挥领导作用，尤其是国际电信联盟（ITU）。

其次，制定数字技术投资标准，提出中国技术基础设施的替代方案。促进替代性 5G 电信设备供应商的发展；在布拉格“5G 安全会议”的基础上，就 5G 网络安全标准达成共识；鼓励印太国家投资可靠和安全的技术和数字基础设施；制定评估框架和标准来审查数字发展项目；协助其他国家实施有效的投资审查。

再次，在推进互联网自由的同时，保护民主国家免受数字威胁。与印太地区国家强化外交接触和援助项目，加深对法治、预防暴力与保护公民权利之间保持平衡的必要性的理解；建设地方弹性和公民社会、监督组织和记者的能力，以监测数字发展；鼓励美国科技公司与当地公民社会领导、学者和记者接触，以更好地理解和学习识别虚假信息。

最后，定义并实施一种体现“自由主义”价值观并能跟上技术创新步伐的数字治理模式。领导多国努力建立数字治理指导方针；支持国内和有争议领域的技术创新；确保为美国国际开发署、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千年挑战公司和美国贸易发展署等机构提供足够的资金和资源，以便在印太国家实施数字发展项目；利用数字技术为传统上被剥夺权利的人赋权。

美学者：美国应结束与以色列的特殊关系

《外交政策》期刊网站 5 月 27 日登载哈佛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M. Walt）的文章称，美国应该改变与以色列的特殊关系，建立像美国与其他国家那样正常的关系。文章摘要如下：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最新一轮冲突以一贯的方式结束：

双方停火，巴勒斯坦人处境变糟，核心问题得不到解决。冲突进一步表明，美国不应再无条件地向以色列提供经济、军事和外交支持。美国和以色列需要的是一种正常关系而非特殊关系。

以前，美以特殊关系可能在道德上是合理的。然而，如今以色列几十年来的野蛮摧毁了美国无条件支持它的道德理由。过去或许认为以色列是美国一项宝贵的战略资产。例如，冷战期间，支持以色列是遏制苏联在中东影响的一种有效方式。然而，冷战已经结束 30 年了，如今对以色列的无条件支持给华盛顿带来的问题比它解决的问题还多。这种特殊关系的成本不断上升。而且这种关系的真正代价是政治上的。

第一，对以色列的无条件支持使美国更难在世界舞台上占据道德高点。当美国单独否决联合国安理会的三项停火决议，反复重申以色列“自卫的权利”，授权向以色列增售价值 7.35 亿美元的武器，对巴勒斯坦人的居住自由和安全发表空洞言论时，它的道德优越感更显虚伪。

第二，特殊关系的另一个代价是在以色列身上耗费过多的外交政策。卷入危机将让美国从气候变化、中国、新冠疫情、阿富汗撤军、经济复苏和一系列更严重的问题上抽走宝贵的时间。

第三，无条件支持以色列使美国中东外交的其他方面复杂化。如果没有内塔尼亚胡政府的持续反对和美国国内以色列游说团体强硬派的反对，拜登政府就更容易与伊朗达成新的协议。保护以色列的愿望也迫使美国与埃及、沙特等其他缺乏战略或道德意义的中东国家政府建立关系。

第四，几十年来对以色列的无条件支持助长了美国面临的恐怖主义危险。美国对以色列的坚定支持和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残酷对待是“基地”组织决定攻击“远敌”的主要原因之一。即使美以是正常关系，恐怖主义风险也不会消失，但更公正、道德

上更站得住的立场将有助于减少反美情绪。

可以肯定的是，美以特殊关系的裂痕已经开始显现。呼吁结束这种特殊关系并不是提倡抵制、撤资和制裁，也不是停止美国的所有支持。相反，是呼吁美以建立正常的关系，就像华盛顿与其他大多数国家的关系一样。在正常的关系下，当以色列做出符合美国利益和价值观的事情时，美国将予以支持；当以色列做出违背美国利益和价值观的事情时，美国将与之疏远。

美国政治/其他

皮尤：美国人对气候变化的态度因代际、党派等因素而异

皮尤研究中心近期就气候变化问题对 13749 名美国人进行了调查。调查显示，大多数美国人表示，联邦政府、企业和其他行为体在减少气候变化的影响方面做得太少。主要发现如下：

对于解决气候变化问题，“Z 世代”和“千禧一代”比老一辈更积极。32%的“Z 世代”和 28%的“千禧一代”表示，他们在过去一年中做了些事情来应对气候变化。而在“X 世代”“婴儿潮一代”和更年长的人中，很少有人表示为此努力过。

年轻美国人比年长者更有可能支持改变美国对化石燃料的依赖，甚至支持完全消除化石燃料。总体而言，大多数美国人(71%)认为，美国应该优先发展替代能源，而不是扩大石油、煤炭和天然气等化石燃料的生产。“Z 世代”和“千禧一代”中约三分之二的人反对增加海上石油和天然气开采，而在“婴儿潮一代”和更年长的人中该比例为 46%。

两党在气候变化问题上都出现了代际差异，尤其是共和党内部在化石燃料的作用上。在共和党和倾向共和党的独立人士中，

年轻人比年长者更不愿支持增加化石燃料能源的使用。例如，“Z世代”共和党人支持水力压裂技术的可能性比“婴儿潮一代”和更年长共和党人低 30 个百分点(44%对 74%)。

美国人对气候政策的评价也因种族而异。当公众评估应对气候变化的建议时，会考虑一些因素。美国人提到的首要考量是为子孙后代保护环境(64%的人认为这非常重要)，其次是确保这些提议能增加就业和经济增长。这些观点因种族和民族而异。约 70%的黑人和超过一半的西语裔(55%)认为帮助低收入社区是其首要考量，而持相同看法的白人成年人比例较小(38%)。另外，黑人和西语裔美国人也比白人更有可能表示自己的社区正在经历环境问题。

拜登迫使共和党重新审视其中期选举策略

《政客》杂志(politico)网站 5 月 17 日载文称，拜登温和的形象使共和党难以在竞选广告中将其树立为一个理想的陪衬，这迫使共和党重新审视 2022 年中期选举的策略。

中期选举通常是对执政党的公投，因此，反对党的一贯做法是将选举与现任总统挂钩。但拜登并不是一个理想的目标，他没有引发愤怒，他治下的白宫也相对缺少戏剧性。基于此，共和党人正准备打破惯例，不把总统作为中期选举的核心人物，而是把他作为左派更广泛的过度行为的“帮凶”。

现在，共和党人正在准备反对“取消警察经费”、社会主义和取消文化。他们将在枪支管制、政府支出和移民方面打击拜登。如果经济放缓，他们还将在经济方面攻击拜登。共和党的战略家和党内官员表示，对拜登个人的强调将少于在以前的选举中对奥巴马或特朗普的强调。共和党并未突出拜登，而是将他与佩洛西、

桑德斯、奥卡西奥-科特兹等更两极化的人物捆绑在一起。

在某种程度上，对拜登缺乏关注反映了共和党人在一定程度上的混乱，他们仍然忙于 11 月选举后的党内争斗。最近众议院共和党人罢免莉兹·切尼（Liz Cheney）共和党会议主席一职说明了这一点。

对民主党人来说，共和党人无法诋毁拜登是在艰难的中期选举形势下难得的亮点。在总统的第一次中期选举中，失势的一方传统上表现良好，许多观察家都看好共和党夺回众议院。

到 2022 年，拜登的形象有可能已经被削弱到足以让共和党人在竞选中利用他。而拜登掌管白宫将成为一些众议院和参议院选举中的一个因素，因为共和党人会呼吁选民通过投票给共和党人来打破民主党对华盛顿的控制。

美智库评《战略竞争法案》对美国产生的负面影响

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 4 月 21 日以 21:1 的高票审议通过了《2021 年战略竞争法案》。这份法案要求拜登政府采取与中国进行全面“战略竞争”政策，在国际上引起了不小的反响。美国智库昆西国家事务研究所近日发布文章，称该法案至少会在四个方面对美国利益产生负面影响。

第一，法案中提到的“有害影响”（malign influence）一词故意煽动恐惧、怀疑和指责，以恐吓那些希望与中国或其他国家进行建设性接触的美国人。这种说法使有关中国的危言耸听的话语正常化，可能会加剧麦卡锡主义式的对亚裔美国人的攻击。任何华裔或任何与中国大学、企业或协会有往来的人都会被视为中国政府的“代理人”。

第二，这种对任何被认为与中国有联系的人或事物的笼统批

评削弱了美中积极关系的基础，从而损害了美国的国家安全。企业、州和地方政府、高校、学者以及侨民社区长期以来一直是动荡而复杂的美中关系的基石。“影响力行动”的概念可能会被误用，让所有这些关系遭受怀疑，阻碍对双边问题的建设性讨论，让最了解中国的美国人无法及时获得一些安全许可，职业生涯陷入瘫痪。

第三，该法案中的做法可能会威胁新闻自由。诱导“地方媒体”或“独立媒体”接受美国政府的资金和培训可能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资助那些并非隶属于美国政府的媒体来推动所谓的反华议程，将损害参与此类工作的记者的信誉。通过操纵自由媒体来支持美国政府提倡的“大国”冲突议程，也会导致公共话语失衡，淹没那些更客观的分析和报道。

第四，宽泛地批评“有害影响”可能导致美国无法有效、明智、有针对性地应对问题和风险。这一笼统概念引发了基于恐惧的言论和保护主义以及反移民的法规，对于对抗真正的威胁几乎没有作用，反而会造成重大的附带伤害。通常情况下，这一战略中涉及的全面禁令实际上使美国人更容易面临隐私风险和国家安全风险。

美智库建议美加强清洁能源供应链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网站近日发布该中心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项目高级研究员尼科斯·查佛斯(Nikos Tsafos)等执笔的报告《回流、改道、再平衡——美国清洁能源供应链战略》，为美国如何增强清洁能源供应链给出了建议。

报告称，清洁能源供应链中的巨额资金有望重塑产业竞争和能源安全的地缘政治。此外，为了实现各自日益雄心勃勃的气候

目标，各国可能会采取更多措施来重塑产业部门。

报告从产业竞争、网络安全和贸易政策的角度，探讨了美国应如何加强清洁能源技术的供应链。报告主张通过关注三个方面：推动低碳能源供应链“回流”、“改道”和再平衡，来对这些市场中日益激烈的产业竞争、更大的网络安全威胁和更频繁的贸易争端做出战略回应。

第一，“回流”。“回流”的基本逻辑是在美国采购商品、制造产品可以减少因依赖进口而产生的脆弱性，同时还能令美国人民受惠于新兴产业带来的经济收益。实施成功的“回流”策略有两大先决条件：一是庞大稳定的市场对于能源与产品的需求；二是有活力和创新的产业部门负责提供能源与产品。

促进清洁能源供应链“回流”的第一步是创造对相关技术的需求，可采取的措施包括：制定严格的规则，限制造成污染技术的市场；通过指标与指令，要求市场参与者从符合某些标准的来源采购部分产品；对产生外部效应的活动征税以改变消费者的成本效益计算方式；通过投资或生产税收抵免等金融激励，鼓励企业获取新能力或建造新设施。在供应方面，成功的政策离不开创新，以及联邦政府、州政府、大学等公共机构和私营企业的持续投资，以推动知识创新与新技术的商业化。但光靠创新还不够，还必须实施更广泛的政策，以激励上游供应商与国内制造业。

第二，“改道”。对进口的依赖并不一定意味着危险或脆弱，但是不同的结构意味着不同的威胁级别。美国有两大选项：一是与没有地缘政治负担或负担有限的供应商培养联系；二是鼓励供应链多样化。

美国还可以效仿日本或欧洲在天然气领域促使供应链多样化的做法，在适当条件下，走出国门并建立新的供应链。美国不需要在国内生产每一种关键矿物，可以借助美国进出口银行

(EXIM) 或国际开发金融公司 (IDFC) 等机构来鼓励开发新的锂矿山或钴矿山, 开设新工厂负责供应太阳能组件面板、风力涡轮机或电池。

第三, 再平衡。当依赖进口不可避免时, 并且当这些进口来自引起战略、经济、人权或环境问题的供应商时, 美国与其他国家选择依靠广泛的政策工具来管理相关风险。这些政策工具可以归为“再平衡”。“再平衡”战略依靠六大要素: 一是明确划定威胁与非威胁之间的界线。二是建立相互依存关系。破坏贸易关系将带来巨大的政治代价, 应当基于这一认识或“等价交换”原则, 找到维持贸易关系的合理空间。三是建立或改革国际机构来管理不安全性。四是利用国内机构塑造供应商的行为。五是低碳时代建立战略缓冲。六是威慑。美国可以调整供应链, 减少对中国产品的依赖, 提升对中国产品的监督, 并增强系统应对干扰的韧性。

本刊所载文章的观点不代表本刊编辑部观点，仅供读者参考。

编辑部：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

地址：上海市淮海中路622弄7号社联大楼201室

邮编：200020

电话：021-33665148

工作邮箱：bianjibu@sias.org.cn